

# 20 世纪中国儒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傅永聚 韩钟文

**[摘要]** 在 20 世纪, 儒学遭遇到空前的危机与严峻的挑战, 也面临着重建与复兴的历史机遇。百年儒学演进及儒学研究的历史大致经历了五个阶段, 在“古今中西之争”及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思潮中, 儒学并没有“博物馆化”, 儒学的命运大致经历了受到怀疑、批判、解构、重新诠释后成为现代思想学术形态, 或获得创造性转换, 以至汇入多元的世界文化大流之中的历程。20 世纪与 21 世纪之交, 儒学不仅是“文化中国”、“全球伦理”建设的重要精神资源, 也是“文明对话”的重要角色, 对 20 世纪儒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既是历史性的课题, 也是一项具有现实性、前瞻性的课题。

**[关键词]** 20 世纪 中国儒学  
研究 回顾 反思

**Abstract** During the 20<sup>th</sup> century Confucianism was confronted with unprecedented crises and austere challenges, but also with opportunities for its reconstruction and revival. Its evolution and the history of its studies have approximately undergone five phases. Confucianism, however, has not been “museum-ized” in the “Debate between the Ancient and the Modern, and between the Oriental and the Occidental”, and in the ideological trend to modernize Chinese culture. Instead, after having been exposed to doubt, critique, deconstruction and re-interpretation, it has come out, with its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s a modern ideological scholarship and syncretized itself into the big melting pot of world culture. At the turn of the 21st century, Confucianism is not only the spiritual resource for constructing “Cultural China” and “Global Ethics”, but also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ivilization Dialogues”. Confucianism studies are therefore a historic project and a practical one with great foresight at the same time.

**Key Word** 20<sup>th</sup> century; China Confucianism; studies; retrospection; review

**[中图分类号]** B2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627(2003)01-0004-08

**作者简介:** 傅永聚(1954— )男, 山东平度人, 博士, 教授。曲阜师范大学副校长, 孔子研究院院长。韩钟文(1947— )男, 江西广丰人, 教授, 曲阜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 孔子研究院兼职研究员。 山东曲阜 273165

儒学是中华文化的主流。二千多年来,儒学一直对中华文化的各个层面产生着巨大而又深远的影响。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民族性格、民族心理结构的形成与构成,与儒学的长期影响和积淀有着密切的关系。进入 20 世纪,在中华文化中占主流地位的儒学遭遇到空前的危机、严峻的挑战,也面临着重建与复兴的历史机遇。百年之间,中国的知识界、思想界或学术界围绕着孔子、儒家及儒学的命运、前景问题展开了持久的、广泛的、深入的争鸣,而且直接或间接地和中学与西学、东方智慧与西方智慧、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传统性与现代性、全球化与中国化、文明冲突与文明对话等等论题联系起来,使争鸣远远超出了儒学的范围,成为 20 世纪中国思想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 (一)

20 世纪中国知识精英、学术精英对儒学的重新评估、研究或慧命相续,与各种思潮、学派、主义之间的思想争鸣、学术论辩交织在一起,更与中国思想文化的现代化、乃至于中国文化的命运与前途紧密相连,从而呈现出罕见的复杂性、丰富性和严肃性。百年儒学的研究与其自身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五个阶段:

一、19 世纪末至 1911 年辛亥革命为第一阶段:萧公权称开拓“儒学第四期”的康有为,发表《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如思想“飓风”,如“火山大喷”,以复古为解放,既开导儒学新方向,又引发“西潮”,预示后经学时代的来临。西学输入高潮的到来,诸子学的复兴,政治革命的风暴席卷神州,社会解体和重建进程的加速,既使儒学步入困境,又遇到生命涅槃的契机。思想界、学术界先觉之士以西方哲学、宗教、学术思想与方法为参照系,以“诸子学”为比较对象,批判儒学或重新诠释儒学已初见端倪。

二、从辛亥革命至 1928 年国民党形式上统一中国为第二阶段:“五四”期间“打倒孔家店”口号的提出,康有为、陈焕章等创建孔教会,梁启超、梁漱溟、杜亚泉等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的崛起,学衡派梅光迪、吴宓等与《新青年》派展开的思想文化论辩,以丁文江、胡适为代表的科学主义与张君勱、梁启超为代表的人文主义之间的论争,形成自由主义、文化保守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三大思潮的冲突与互动,批判儒学、重释儒学、复兴儒学,赋予儒学现代哲学、现代学术新形态。钱穆在《现代中国学术论衡》序言中说:“民国以来,中国学术界分门别类,务为专家,与中国传统通人通儒之学大相违异。”以西方现代学术为参照系,分哲学、史学、政治学、伦理学、宗教学、文艺学、心理学、经济学、教育学等等,将数千年的儒学、经学作为学术思想资源或资料,分门别类地纳入专题研究之中,使“内圣外王之道”为精神内核的通人之学一变而为专家之学,这一转变一直沿续到今天。

三、1928 年至 1949 年建国是第三阶段:抗日战争的爆发、救亡运动的高涨,使民

族文化复兴运动形成高潮，儒学获得创造性重建的历史机缘。不少有识之士都指出，当时的中国已进入“一个民族复兴的时代”，而民族复兴本质上应该是民族文化的复兴，儒家文化的复兴。如果中华民族不能以儒家思想或民族精神为主体去儒化或华化西洋文化，则中国将失掉文化上的自主权，而沦为文化上的殖民地。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将“援西学入儒学”，上接宋明新儒学的传统，创造性地诠释、综合与会通儒学与西学，使古典儒学成功地向现代思想、学术形态转换。这一时期出现的以熊十力、贺麟、牟宗三等为代表的新心学，以冯友兰为代表的新理学，是现代儒学走向成熟的标志。在儒学研究方面，胡适的《说儒》（1934 年）以及其他作品，在发现儒家理性主义与人文主义精神方面有新的突破。张申府反思“五四”时期启蒙运动的意义与限制，提出“打倒孔家店，揪出孔夫子”的口号，认为新的启蒙运动既要继承与弘扬“科学与民主”精神，又要提倡民族的自觉与自信，进行文化上的综合创造，超越“五四”。此外，王新命、何炳松等 10 教授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1935 年 1 月 10 日），张岱年的《关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1935 年 3 月 18 日），都强调中国文化不同于西方文化的特色，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是创造，或创造新的中国本位文化，是中国民族复兴的惟一出路。在民族复兴、文化复兴的精神氛围中，一种“后五四建设心态”已经形成，儒学精神之展开与儒学研究也是朝建设的趋向发展，儒学研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学术成果。

四、1949 年至 1976 年为第四阶段：余英时在《现代儒学论》序言中指出：20 世纪上半叶，无论是反对或同情儒家的知识分子都曾是儒家文化的参与者，因为他们的生活经验中都渗透了不同程度的儒家价值。但 1949 年以后，儒家的中心价值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已不再公开露面。中国的知识分子无论对儒学抱着肯定或否定的态度，都已没有做参与者的机会了。儒学和制度之间的联系中断了，成为陷于困境的“游魂”。就实际情况而言，这一阶段儒学精神的开展或儒学研究比余英时所分析的还要复杂，值得重视的是出现了分化现象。大陆出现批判儒学的新趋向，前期是批判性的研究为主，原来被视为现代儒学的代表人物，除梁漱溟、熊十力等少数人外，象冯友兰、贺麟等都改造思想，脱胎换骨，以致批判自己前期的新理学和新心学，即使他们研究孔子、儒学的文章，也离不开批判性研究的框框。而当时的思想界、学术界以“唯心”与“唯物”、“反动”与“革命”等教条对孔子至康有为的儒家代表人物进行划线，断章取义地进行批判是司空见惯之事。70 年代中期则出现群众性的批孔批儒运动，连冯友兰也迫于形势撰写批孔文章，根本无学术性研究可言。在港台地区与海外华人社区，儒学却得到不同程度的认同，移居港台以及旅美的学者，如张君勱、钱穆、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陈荣捷等，立足于教育界、学术界，继续以弘扬儒家精神为己任，开拓儒家的精神新方向。新亚书院的创建、《民主评论》、《人生》等杂志的创办、东方人文学会的成立、张君勱的环球讲学，特别是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张君勱四人联名发表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1958 年），显示了儒学精神与儒学的生命力。

五、70 年代后期至 21 世纪初为第五阶段：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论争、东亚经济奇迹或东亚现代化模式的出现，全球化进程中形成的文化多元格局、“文明对话”、“全球伦理”的倡导，这一切都使得人们对孔子、儒学的估价出现了戏剧性的转变。在中国大陆孔子、儒学研究逐渐成为“显学”，论文、专著大批量产生，有关孔子、儒学、中国传统文化的学术会议频繁举行，中国孔子基金会、中华孔子学会、国际儒学联合会、中国文化书院、孔子研究院等学术团体和研究机构纷纷建立，儒家经典的现代诠释，儒学与佛教、道教、西方哲学及西方宗教的比较研究，中国儒学史的研究，现代新儒学的研究，儒学与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的论辩、对话与互动，儒学与 21 世纪等等论题，先后成为中外学界关注的热点。虽然总的说来“儒门淡泊”的境况仍然存在，但恰如杜维明所称的已有“一阳来复”的态势。有关“儒学第三期”、“儒学第四期”的展望，在海内外思想界已经流行，儒学在多元化的世界文化格局中将成为文明对话的重要角色。

## （二）

儒学自汉代被定为“独尊”以来，一直是官方哲学，是统治者治国平天下的指导思想，在中国社会具有特殊的地位和意义。据学者们的研究，在传统社会，儒学不只是一种单纯的哲学或宗教，而是一套全面安排人间秩序的思想体系，从一个人自生至死的生命过程，到家、国、天下的组成与治理，都在儒学的范围之内，儒学渗透到中国文化各个层面。就其系统性而言，儒学大致有四个层面：超越性儒学、制度化儒学、社会化儒学与深层化儒学。换一个角度看，儒学又有“道德化儒学”或“生命儒学”与政治化儒学或政治儒学以及综合形成的儒学之分。儒家的“外王”理想，在现实中的贯彻中，由于社会与政治的影响，也会形成不同的侧重点，如牟宗三分析的“政治”、“事功”与“学术”三个层面。刘述先将儒家分为三种类型：精神的儒家、政治化的儒家与民间的儒家。上述理解有助于对儒家、儒学及其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作深入的研究。

古代的儒学大师的学术精神以宏博、会通、综合为特色，所谓“通儒”、“通人”之学，文史哲不分家等，皆指此特色而言。而自 20 世纪初开始，确如马克斯·韦伯所描述的，现代化是合理化、分化、专业化与职业化。“中国学术界分门别类，务为专家，与中国传统通人通儒之学大相违异”（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序）。以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分类为范式，突破儒家以六艺统摄一切学术的“通儒之学”的界限，移植与改造西方的学科建制、学科分类、研究方法及概念、范畴等等，逐步形成“分门别类，务为专家”的现代学术系统；即使对儒家、经学或儒学的研究也不例外。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胡适、陈寅恪、钱穆、汤用彤、金岳霖、贺麟、冯友兰等深知“一事不知，儒者之耻”的传统是可贵的，有“求为一专家，不如求为一通人”的学术志向，但

在传统学术向现代性学术转型的大势下,仍然以专一、二门学科为主,在专上求会通或旁通。纵观百年儒学的演变历程与儒学研究的学术成果,“专门之学”代替“通儒之学”乃是大势所趋。这既表明儒学由“道”向“术”转变的特征,也是分门别类总结百年儒学研究的现实依据。

冯友兰在《中国中古近古哲学与经学之关系》中,将中国哲学史划分为子学时代与经学时代。自孔子至淮南王为子学时代,自董仲舒至康有为为经学时代。以孔子、子思、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创建于“子学时代”,至董仲舒以后,儒学逐渐取得主流地位,孔子教人的课程“六艺”也相应成为经典。儒家之学,被确定为经学。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说:“君子知在位者之不能以恶服人也,是故简六艺以贍养之。诗、书,序其志;礼、乐,纯其美;易、春秋,明其知。六学皆大,而各有所长;诗道志,故长于质;礼制节,故长于文;乐咏德,故长于风;书著功,故长于事;易本天地,故长于数;春秋正是非,故长于治人。”《汉书·儒林传》则说:“古之儒者,博学乎六艺之文。六艺者,王教之典籍,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伦,致至治之成法也。”

儒家的典籍一旦成为“经”,成为人们思想与行为必须遵循的准则,则儒家学派创始人的原则与精神就难以得到真正全面的发扬了。从董仲舒到康有为,大多数著书立说的人,都要坚持以经为根据、为标准,方能为一般人接受或信服。即使象朱熹、王阳明、王夫之、戴震那样富有创造精神的思想家,也常是“寓创造于注疏之中”,或者说“六经责我开生面。”所以,近二千年来的思想史、学术史主要是以“经学”为中心而展开的,所谓“今文家之经学,古文家之经学,清谈家之经学,理学家之经学,考据家之经学,经世家之经学”,皆经学在不同时代的变化。如晚清儒家“经世”精神觉醒,从庄存与、龚自珍到廖平、康有为等复兴今文经学,在中国思想史上再一次确立了与理学家之经学、考据家之经学等等不同的“经世家之经学”。

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体现了一种改革精神,而孔子在他的心目中则是一个最伟大的改革家、救世者,西方文化的挑战与传统儒学内部变革的要求所形成的交互影响,铸成康有为“经世家之经学”的独特风格,而君主立宪与国家富强的政治目标,又是对儒家“内圣外王之道”的外王精神的新开展。因此,从主导因素看,20世纪中国的思想学术虽然已走出“经学时代”,进入“后经学时代”,但从思想学术演进的内在理路看,恰恰又是从经学的变革启端的。

“援西学入儒学”。辛亥革命以来,以西方近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分类为范式、为参照系,对儒家所推崇的六艺以至经学进行改造、或作新的诠释与分类,就成为20世纪儒学精神之开展或儒学研究的一大特色。所谓儒学现代化,所谓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型,都与西方思想学术的冲击及儒学内部变革要求的交互影响有关。如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国文化要义》、《人心与人生》,梁启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儒家哲学》、《孔子学案》、《游欧心影录》,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新理学》、《新原

道》等“贞元之际所著书”，贺麟的《当代中国哲学》、《文化与人生》，张君勱的《民族复兴之学术基础》、《新儒学思想史》、《中印西哲学文集》、《义理学十讲纲要》，方东美的《中国人生哲学》、《生生之德》、《新儒家哲学十八讲》，唐君毅的《人文精神之重建》、《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牟宗三的《道德理想主义》、《心体与性体》、《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现象与物自身》，徐复观的《中国人性论史》、《两汉思想史》、《儒家政治思想与民主自由人权》，杜维明的《宋明儒学思想之旅》、《论儒学的宗教性》、《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等等，基本上都是为创造性地回应西方思想学术的挑战，重新诠释儒学或重建儒学的论著，其精神风貌已不同传统经学或传统学术，是 20 世纪中国现代思想学术的一部分，是中西思想学术交流对话、互相诠释及会通融合的产物。

沈有鼎所展望的中国文化第三期：“是要以儒家哲学的自觉为动因”，建构“穷理尽性的唯心论大系统”。贺麟断言的“中国现代的文化动向和思想趋势”，将是“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以儒家思想或民族精神为主体去儒化或华化西洋文化，“转化、利用、陶铸西洋文化以形成新的儒家思想、新的民族文化”。牟宗三强调说“儒学第三期之发扬”，将为积极的、建构的、综合的、充实饱满的和更为逻辑的，重点即在于其内在的目的，要求科学与民主政治的出现，要求现代化。刘述先所说的“儒家理想与中国现实的互动”、“儒家思想的现代化”，以儒家“理一分殊”的精神回应当代西方哲学的挑战。杜维明所说的“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创造的转化”、“儒家人文主义的第三期发展”、“植根儒家传统和充分吸取西方现代精神”、“多元文化背景中的儒学创新”。李泽厚论“儒学四期”时所称的“必须面对当代现实问题的挑战，这才是儒学发展的真正动力”。“在今天承续发展儒学传统，至少需要从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以及各现代这些方面吸收营养和资源，理解而同化之”。所有这些，都展示了中国学人为儒学的新发展所设计的路径、开示的方向，以及所做的努力。

列文森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运用了“博物馆”的比喻，象征儒家传统的终结或死亡。当我们回顾与反思 20 世纪中国儒学精神开展的历程时，当然会感到其命运的曲折坎坷与艰难困苦，但其精神并没有像列文森所称的“博物馆化”，在三四十年代有“贞下起元”之象，在八九十年代出现“一阳来复”之运，儒学成为“文明对话”、“全球伦理”以及多元文化中的重要角色。在“新轴心时代”的文明对话中，人们珍重的不仅仅是儒家的“学”或“学术”，更重要的是儒家的“道”或人文精神。儒学面向当代，面向未来，仍然能够提供有独特价值的精神资源，这就是儒学常变常新的生命力。

### (三)

别是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联系尤为密切。围绕着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中学与西学,旧学与新学,西化或俄化与中国化或本土化,文化的时代性与民族性,中国文化的命运及文明的对话与会通等等问题展开的论争,都涉及孔子、儒家学派及儒学的课题,并形成不同的观点、思潮及学术流派。

从总的趋势看,在中国文化转型的历史进程中,儒学的命运大致经历了受到怀疑、批判、解构,重新诠释转为现代学术形态,或获得创造性转换,以至汇入多元的世界文化大流之中的历程。在20世纪中国,曾出现过比唐宋之际更严重的“儒门淡泊,收拾不住”的低谷现象,也出现过否极泰来、一阳回复的儒学思想新开展的局面。至20世纪末儒学又成为“文明对话”的重要角色,成为“文化中国”、“全球伦理”建设的重要资源。“儒学的第三期发展”、“儒学第四期”等课题已成为中国思想学术界讨论的显性论题,儒学与21世纪也成为国际学术界关注的话题,西方文明的危机与东方智慧的再发现,是儒学在“文明对话”中充当建设性角色及多元化文化背景下儒学创新的契机。因此,对20世纪儒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不仅仅是历史性的课题,而且是一项具有现实性、前瞻性的课题。

王国维在《国学丛刊》序中曾说:“学之义,不明于天下久矣!今之言学者,有新旧之争,有中西之争,有有用之学与无用之学之争。余正告天下曰: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他又说:“余谓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站在通人之学或通儒之学的立场上,王国维所论是有道理的;而从现实层面作具体分析,百年来中国思想文化之演进,“古今中西”之争恰恰是焦点所在,这是制约百年思想文化发展、特别是儒学研究的重要因素。“古今中西之争”,也是导致学派分化及不同学派对儒学持有不同看法的原因之一。

百年来,就儒学与西学、与新学、与现代化的关系而言,大致上出现了如下思想观点:一,国粹论,如章太炎之著《国故论衡》,研治经史的学者编印《国粹学报》等;二,中西会通论,如蔡元培、杜亚泉、梁启超、汤用彤、吴宓等主张会通中西智慧;三,中国文化本位论,如王新命、何炳松、萨孟武等10教授发表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四,中体西用论:如张之洞的《劝学篇》、陈寅恪的《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也偏于中体西用论;五,西化论及全盘西化论:如陈独秀、胡适、陈序经等人的文化观;六,西体中用论:如李泽厚有《漫说“西体中用”》之专文,而劳榘在《追悼胡适之先生异论“全盘西化”问题》(1962年)一文中已有“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提法;七,中国本位的中西互为体用论:傅伟勋在《中国文化重建课题的哲学省察》中提出此论;八,创造性转化论:林毓生、傅伟勋及杜维明等都有类似的论述;相近的提法但内涵不尽相同的还有李泽厚的“转换性的创造”论;九,综合创新论:张申府、张岱年、苏渊富、方克立等提出与发展了综合创新论;十,现代化论:这是30年代以来一种比较普遍的观点,用以代替欧化、西化、俄化等

提法，如潘光旦、胡适赞同“充分现代化”，张君勱、牟宗三、杜维明等也倡导儒学现代化；十一，世界化或全球化论：金耀基在《从传统到现代》一书中就发挥了胡适“充分世界化”的观点，并强调世界主义是中国文化的特质之一；李慎之在《全球化与中国文化》、《辨同异、合东西》等文中则提倡全球化。当然，百年来有关古今中西之争的论述并不止于上述十类观点，但这十类观点是最具代表性的。百年来有关孔子、儒家、儒学的研究，之所以出现批判、否定、复兴、重新诠释、创造性的转化等等现象，固然有复杂的历史原因与现实原因，但与不同学派所持的文化观也有内在联系。即使在 21 世纪，全盘否定儒学的观点已不占主导地位，但类似的论争还会延续下去。而此类论争的延续与深化，恰恰说明儒学并没有“博物馆化”，儒学的生命力一直在延伸着。儒学好比一棵充满生命力的老树，它会生生不息，于忧患中奋然挺立，以广大和谐的人文精神化育人生、泽惠万方。

唐君毅在《中国之乱与中国文化精神之潜力》一文中说：“中国文化精神，不主在人与人间造成壁垒，乃早超过了种族民族狭隘的国家观念。中国文化之一特别伟大之一好处，我们可以借《水浒》中一人之外号‘没遮拦’名之，中国人之受苦与吃亏，都是由于没遮拦之精神。”所谓“没遮拦之精神”，“即是开放的、宽容的、海纳百川的精神。植根于中国文化土壤之中的儒学，具有这种“没遮拦”的精神或品格。从孔子到康有为、梁启超，历代大儒也持守这种开放精神。主体独创性、包容涵摄性、精神延续性及传播辐射性是儒学的重要特征。儒学犹如波澜壮阔的黄河、长江，经过二千五百多年的流淌，不知经历了多少曲折、困顿，流过多少险滩，从曲阜到中原，从中国到东亚各国，还辐射欧美、流向全球。展望 21 世纪，儒学将像过去创造性的回应印度文化挑战一样，经历百年多西方现代文化的挑战之后而获得再生。